

英 国 谍 报 史

〔英〕理查德·迪肯 著

A History of



British Secret Service

英 国 谍 报 史

〔英〕理查德·迪肯 著

乐爱妹、陈轶等 译
杨洁篪 校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Richard Deacon
A HISTORY OF
BRITISH SECRET SERVICE

根据英国格拉纳达出版公司1980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蒋红妹
封面设计：张良国

英 国 谍 报 史

[英]理查德·迪肯 著
乐爱妹、陈铁等 译
杨洁篪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戏剧印刷厂排版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5 字数：327,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3003·1667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故事形式叙述了从英王亨利七世至今英国情报机构的四百年历史，分析了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工作成败的原因，着重描述了它在西班牙之争、法国大革命、爱尔兰独立运动及两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情报工作。本书还叙述了英国的军情五处、军情六处、海军情报处、陆军情报署等主要情报组织的形成、发展及其相互间的矛盾、斗争，并刻画了各个时期从事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主要人物。最后分析了二次大战以来的新动向，提出了新任务。从全书中可以了解到英国的情报组织对历届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所起的作用。

序

这是《英国谍报史》一书的最新修订本，本书原于1969年出版。然而，也许这样说更恰当些，任何一本有关情报机构历史的书籍都不可能搜集到完整的最新史料，这只是因为许多史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得到的。

英国情报机构在这方面较之世界上其他情报机构更为突出。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学家受阻于国家档案须在三十年后方可公布于众的规定的限制，而且是因为文官（有时政客）销毁了那些他们永远不想让公众审阅的文件。

然而，了解史料的渠道正在慢慢地被打开，当权人士也远不象十年前那样竭力反对公布史料。在《英国谍报史》初版发行前夕，政府 D 通告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要求看该书的打字稿。这一要求当然遭到了拒绝。他只是在该书发行时才得到了样本。今天，人们肯定不会提出这样蛮横的、实际上 是不合理的要求。我无意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或透露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我殷切地希望见到终止隐姓埋名的阴谋活动和暗中设置障碍，这种行为对国家毫无帮助，在过去倒反而使得叛徒猖獗一时，为严重错误打了掩护。

本书的修订过程本身也饶有趣味。首先，我要考虑最近十年来发生的事件。其次，我可以阅读那些在此期间公布于众的文件和档案。但最有意思的也许是，读过本书原文的世界各地人士（除英国外，本书还在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发行）通过信件和与我个人的接触，向我提供了很多新情况。

一些读者建议在新版本中介绍某一名间谍。有人建议我介绍有关间谍安德烈少校的情况，威斯敏斯特教堂即将为他树碑，我对此建议深表谢意，并已遵行。事实上，我不仅试图充实最近十年的内容，而且还设法完善有关过去四百年的资料。因此，我在新版中把娅符拉·贝恩女士列为第一名有作为的英国女间谍。

我的朋友经常以嘲笑的口吻对我说，人们过高估计了间谍的作用，“间谍活动不就是一场毫无必要的游戏吗？”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有时间谍活动变得幼稚可笑，有时却能改变历史的航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巧妙地开展了两面间谍活动，这对纳粹分子放弃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想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如果斯蒂芬·艾利作为一个英国间谍执行他的使命去杀害斯大林，那么俄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是本书新版中增添的精采故事之一。

人们还会问，在这不断重新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今后的十年又将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呢？

理查德·迪肯

目 录

序

第一 章	前言	(1)
第二 章	思罗格莫顿和沃尔辛厄姆	(9)
第三 章	都铎王朝的密码术和心理战	(27)
第四 章	亨利·沃顿爵士和托马斯·张伯伦	(41)
第五 章	克伦威尔的间谍大王——约翰·瑟洛	(50)
第六 章	从莫里斯大臣到马修·普赖尔	(60)
第七 章	丹尼尔·笛福	(70)
第八 章	打击詹姆士党的间谍活动	(81)
第九 章	威廉·伊登改组情报机构	(95)
第十 章	威灵顿的情报机构	(108)
第十一章	托马斯·比奇——活跃于美国的两面间谍	(115)
第十二章	十足的古怪人：卡瓦纳、伯顿和赖利	(130)
第十三章	军情五处的诞生	(152)
第十四章	德国间谍的威胁：1902—1914年	(170)
第十五章	令人生畏的三驾马车：曼斯菲尔德·卡明、 巴兹尔·汤姆森和“眨巴眼”霍尔	(185)
第十六章	弗农·凯尔——军情五处“之父”	(202)

第十七章	第四十号房间的成就	(215)
第十八章	特殊间谍扎哈罗夫	(231)
第十九章	在爱尔兰的失败 在俄国的反攻	(247)
第二十章	西德尼·赖利的最后一搏	(265)
第二十一章	三十年代的军情六处：政策不定	(283)
第二十二章	戴维·皮特里爵士的任务	(299)
第二十三章	特别行动署的组建	(313)
第二十四章	神秘主义与间谍工作 赫斯使命的杂 闻	(330)
第二十五章	富有想象的计划 举不胜举的事例	(343)
第二十六章	帮助法国抵抗运动	(359)
第二十七章	“露西”谍报网	(373)
第二十八章	利用黑手党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之谜	(387)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女性的功绩	(403)
第三十章	身居高位的奸细	(409)
第三十一章	秘密情报处和军情五处的变迁	(426)
注释		(451)

第一章

前　　言

撰写一本有关任何情报机构的历史书要冲破重重难关。

一大难关是，正统的历史学家对从历史的角度写间谍这一主题的做法本身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把情报机构的活动与一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和发展相联系在一起既不明智又不符合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持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然而，不可否认，间谍活动取得了一些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往往是不会加以公开宣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电报”案件就是一例。

打算写情报机构历史的人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他写的年代离今天越近，困难就越大。古代的史料较为齐全，但是，越往后，事实被隐瞒得越巧妙，法律和官方的保密条例必然越来越象暗礁险滩，更不用提有关诽谤的法律了。如果人们写得太深，或本人曾参与过情报工作，或使用官方保密条例所涉及的文件，这将不仅不利于写作，有时还会成为写作的真正障碍。

为了充分说明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我在此援引 M.R.D. 富特所著《特别行动委员会在法国：介绍 1940—1944 年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在法国的活动》一书中的话。富特在书的序中写道：“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我自然尽可能作全

面、准确、客观的介绍。倘若书中仍有不准确之处，我与其他一样，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有关这方面已有的出版物错误百出，而未公开的档案材料又往往互相矛盾、杂乱无章、令人不解。”

另一个难关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带有偏见——首先是自己的偏见，也还有材料来源中的偏见。本书的宗旨是竭力避免受官方偏见的影响。简言之，我尽力使本书不受官员们的约束或限制。实际上，这决非是一部官方的历史书，也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审查。

鉴于上述宗旨，作者在书中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并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只有事实能对作者的看法起约束作用，然而，有时一部分事实否定了另一部分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只得通过解释，作出探测性的结论。

我认为，文件和事实表明，英国情报机构的各部门无论是在能力还是在效率方面，其不稳定程度均超过了任何外国情报机构。在以往的年代里，英国情报机构有时成绩辉煌，有时连遭惨败；有时为谋取有价值的成果所提供的经费少得可怜；有时由于活动经费增加了，情报机构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方式也随之而大为改观。

一般地说，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经费多少、挂名领导人的能力如何，以及当时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态度，都直接关系到该机构工作的成败。

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支精明强干的情报队伍，则必然遭到失败，这是从特洛伊城鼎盛时期至今的历史中得出的教训。对小国和中立国来说，保持这样的情报队伍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不管开支如何节约）。瑞士能取得并保持中立，其中也有它那小而精的反间谍机关的一份功劳。以色列则是

再好不过的例子。这个小国不仅有能力保卫自己，而且几乎全靠其间谍组织的报告取得了六天战争的胜利。

有一点必须在开始时就加以彻底澄清。书中“英国情报机构”这一含义不清的名称并非专指英国的某一情报组织。而是指英国所有的情报组织——秘密情报处、军事情报第五处和第六处、海军和陆军情报部门以及其他较不出名的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均为本书的研究课题。偏重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会歪曲事实。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历史中，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时期起着主导作用，诸如特别行动委员会和经济战部的情报处等临时性组织也曾常常在关键时刻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牛奶树下”的叙述者在开场白中急不可待地说“从头讲起”，但是，从历史和事实的角度来看，确切指出英国国家情报活动的起源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历史以至于传说表明，在人类出现时，就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情报活动。人们可以称挪亚^{*}放鸽子探听洪水退否一事是已知的第一种空中侦察尝试。伦敦警察厅特别部的创始人巴兹尔·汤姆森爵士曾说过：“如果迈普塔富法老手下有一个高效率的情报机关，古代以色列人就不会迁出埃及。”

在欧洲，各国的间谍活动是通过利用大使、使者当特务而逐渐开展起来的。当时，外交和偷窃几乎是同义词。但在中世纪，这种形式的间谍活动主要是针对英国的，英国的驻外使节则很少搞这类间谍活动。1293—98年的英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托马斯·特伯维尔爵士实际上就是个为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效劳的特务。他被派回英国，煽动苏格兰人和威

* 基督教的《圣经》中谈到的洪水后的人类新始祖。——译者

尔士人反对爱得华一世。在别国单方面派间谍打入英国多年后，英国人才逐步克服了自己的保守思想，认识到，驻外使节如能向他们提供有关别国政策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情报，这将是很重要的。现代外交起源于威尼斯。早在1268年，威尼斯的大使在回国后的十五天内，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政府全面汇报自己执行使命的情况，并回答它提出的问题。

都铎王朝时期，威尼斯大使们的活动促使了英国反间谍机关的萌芽。亨利七世感到，随时掌握敌手的动向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在国内外雇人刺探沃贝克和萨福克的阴谋计划，但这些人根本称不上是一支有组织的安全部队。在亨利七世执政期间，情报工作拖泥带水，效率极低。英国情报工作出师不利。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情报工作稍有改进，甚至在反间谍方面取得了一两个突出的成就。1515年，威尼斯驻伦敦大使朱斯蒂尼尼发现自己的信件被英国政府人员打开过。他向沃尔西红衣主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向威尼斯共和国首脑报告：“我在接到陛下给我的信件之前，在坎特伯雷的英国政府官员从信使身上搜走这些信件并拆开看过。尊贵的法国大使巴多尔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也有类似的遭遇。”^①

在整个欧洲，截取外交信件的行为司空见惯。因此，许多国家不得不采用密码和暗号。在这方面，威尼斯人再一次证明自己胜人一筹。直到1868年，两名学者才破译了玛丽一世时威尼斯驻英国大使迈克尔使用的密码。

然而，英国间谍工作的发展应归功于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即位前几年，被理查三世逼得无处安身，因而他亲身体验到掌握一个私人间谍网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他手下间谍的警惕性高，才挫败了理查三世打算在不列塔尼绑架他的阴谋。

在这件事上，他的救命恩人是克里斯托弗·厄斯威克，此人后来成为伦敦市民刑首席法官。但是，亨利七世的情报组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属于私人的，而不是国家的。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对自身安全不那么注意，他把一切有关情报的问题交给国务大臣们处理，先是沃尔西，后来是托马斯·克伦威尔。沃尔西虽然对主子较为忠心，但他却未能实现搞间谍工作的附带目的——使自己当选教皇。

托马斯·克伦威尔同沃尔西一样雄心勃勃，性格刚强。他办事干脆利落，在接管了七拼八凑的间谍机构后，便努力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他增加了情报人员，在英国内部建立起完整的恐怖网。此外，象都铎王朝早期那样，除了积极开展海外的间谍活动外，主要是进行反间谍活动，因为亨利八世为英国制定了一项光荣孤立的政策。他对英国在国外的情报活动至多不过稍感兴趣，有时甚至漠不关心。克伦威尔设立的恐怖网是为了侦查所有对社会不满的英国头面人物，并通过审判或暗杀除掉他们，他总是选择最方便的手段。克伦威尔要对付诡计多端的西班牙大使查普伊斯，查普伊斯想方设法在北部、西部和威尔士给英国政府制造麻烦。如果没有克伦威尔，查普伊斯在伦敦的破坏活动肯定也会有所成效的。托马斯·莫尔受审时里奇提供的伪证表明，克伦威尔通过他手下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影响司法工作。

然而，当时英国仍缺乏一个专心致力于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情报机关。克伦威尔往往只是为了配合实现其主要目的才偶然开展情报活动。他组织过对修道院的巡视，为时九个月，所获得的秘密情报，比为了遏制、整治和解散修道院所需要的情报量还要多。白金汉副主教理查德·莱顿博士是积极为克伦威尔效劳的人之一，他于1535年10月写信对克说：

“不管是大修道院、附属修道院和小修道院还是北方其他寺院，在其周围十至十二英里之内，都有利博士和我所熟悉的人，因此，在这个国家内任何捣乱活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②

当然，克伦威尔组织的巡视更类似于政治迫害，而不象堂堂正正的调查。直到1533年，他才试图在国外开展正规的间谍活动。即使在那时，这种谋取情报的活动仍然几乎是毫不掩饰的。克伦威尔的意图在于绕过不关心外事的英王，在欧洲大陆上为英国寻求盟友，他决定调查与德国结盟的可能性。为此，他派了两人去德国周游，以便报告那里的政治和宗教形势。其中一人是克的朋友斯蒂芬·沃恩。但是，他们此行收获甚微。信奉路德教的君主们对与亨利八世结盟兴趣不大。

克伦威尔具备一个理想的情报负责人所应有的许多素质。他不仅思路清晰、办事利索，而且认为，要防患于未然，就必须行动迅速，万无一失，并且要制定长期计划。他的这种政策在国内颇有成效，但在外交事务方面却只能导致他本人的垮台：他的长处却成了他的致命弱点。迪肯斯教授在他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与英国宗教改革》一书中写道：

“不管报告中描绘的形势多么险恶，稳坐钓鱼台的绝招往往给英国带来好处，由于欧洲的形势瞬息万变，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制定短期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在都铎王朝曲折的外交史中，人们常常看到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之争。象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到头来总是安然无恙，而本来能创立各种制度的渥尔塞和玛丽一世等教条主义者却最终倒了霉。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都介乎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但克略倾向于教条主义者。”

在这场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冲突中，情报活动的组织工作必然受到影响，特别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往往获胜。亨利七世的行动有点欠章法，起先他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情报系统来保护自己的王位。伦敦市民刑首席法官克里斯托弗·厄斯威克是他的主要情报人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厄斯威克是其主子的私人特务，而不是间谍活动的领导人。但是，下一章将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人的事迹，他凭着自己的毅力、聪明才智和爱国主义精神，慷慨解囊成立了一个组织，从而使他赢得了英国情报机构创始人这一当之无愧的称号。

总的说来，在历次重大危机和战争时期，英国情报机构都为国家作出了良好的贡献，但在某些小规模战争或和平时期，却遭受了严重挫折。英国情报机构在爱尔兰的工作与其他地方相比较一直很出色，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内，工作效率极高。驻爱尔兰的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爱尔兰叛乱分子，而且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利用爱尔兰人搞阴谋，制造麻烦。但在最后的三年中，这个情报部门内部混进了敌人，组织涣散，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

此外，有时外交部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起了妨碍作用，有时政府对它提出的告诫又不予重视。内维尔·张伯伦任首相期间所发生的事就是最新的例子。

显然，现在还没有一本叙述情报机构全部历史的书籍。即使所有有关的文件和档案都可供参阅，人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伪存真，剔除报告中的夸大部分，对互相矛盾的材料作出解释。但是，人们在详细研究了英国情报机构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后，确实看到了它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发展过

程，看到了它那千变万化的手段和不变的本质及其特有的发展趋势，还看到了那些踏实、勇敢、精明强干的情报人员和负责人。

值得指出的是，在英国间谍活动中个人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任何情报机构中个人的作用。尽管集体的间谍活动趋势日益增长，然而，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个人的间谍活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发挥的作用往往比一组情报专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第二章

思罗格莫顿和沃尔辛厄姆

十六世纪中叶，英国统治阶层开始采纳马基雅维里*的某些箴言。托马斯·克伦威尔本人的许多政策就是在马基雅维里的美德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即一个伟人凭其果敢的行动，至少可以掌握并非命运所能决定的那部分前途。至于虔诚的新教徒尼古拉斯·思罗格莫顿爵士，人们经常把他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

1559年5月，尼古拉斯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他在任期内成为英国驻外大使中第一个着手认真组织情报工作的人，尽管当时情报工作的范围很小。他搜集的情报内容多、价值高，而且成为英王国务秘书塞西尔的主要情报来源，他向塞西尔通报了法国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策。塞西尔利用思罗格莫顿的信差桑迪·怀特洛与苏格兰的叛乱分子进行秘密联络。

在对待情报人员中碰到的一个老问题是如何预计他们对某种情况的反应，并同时考虑到他们的偏见。思罗格莫顿向塞西尔全面报告了桑迪·怀特洛的情况，说他“头脑清醒，为人诚实……，笃信宗教，因此你必须尽可能少让他看到英国的罪恶现象。”^①

*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